恋地与留声：周智慧散文创作的感官民族志意义

楼旸

摘要：周智慧的散文集《解忧牧场札记》超越单一的“观看”写作范式，形成感官民族志式的边地生活史记录。文学形式的感官民族志植根于作者与地方互动的具地体验，是作者身体、灵魂与地方环境相互融合而生成的有机知识。周智慧在该书中创作出具有生命感与想象性的阿勒泰边地音景，揭示出“地方”不再是一个静态概念，而是在随机感官事件作用下形成的连续过程。阿勒泰地区游牧传统与社会现代性复杂结合的边地声音样态，呈现为不同时代声音感知前后交替、互相碰撞的间奏形态，以及隐含冲突的时空逻辑。阿勒泰的若干声音线索，不仅形绘出迈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疆实践图景，更在“听觉想象力”中生成新时代新疆的地方想象以及“新西部”形象。

关键词：新西部文学；周智慧；感官民族志；声音研究；恋地情结

Attachment to Place and the Leaving of Sound: The Significance of Sensory Ethnography in Zhou Zhihui’s Prose Writing

Lou Yang

Abstract: Zhou Zhihui’s prose collection *Notes from a Worry-Free Pasture* transcends the singular “visual” writing paradigm and forms a sensory-ethnographic record of borderland life history. Sensory ethnography in literary form is rooted in the emplaced experience of the author’s interaction with place, an organic knowledge generated through the mutual integration of the author’s body, soul, and local environment. In this book, Zhou Zhihui creates a soundscape of the Altay borderlands imbued with vitality and imagination, revealing that “place” is no longer a static concept but a continuous process formed under the action of contingent sensory events. The borderland sound patterns arising from the complex combination of Altay’s nomadic traditions and social modernity manifest as an intermezzo form in which sound perceptions of different eras alternate and collide, along with a spatiotemporal logic of latent conflict. Several sound threads in Altay not only depict the picture of Xinjiang’s practice in its march towar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but also generate, within the “auditory imagination,” a new-era local imagination of Xinjiang and a “new West” image.

Keywords: new Western literature; Zhou Zhihui; sensory ethnography; sound studies; topophilia

引言

感官民族志（Sensory Ethnography）的诞生源自人类学内部“作者权威”的表征危机，后成为民族志研究的“一种风格、一种伦理规范以及一种具体的田野调查方式”[①]。感官民族志历来聚焦民族志记录电影中视像与声音的具身真实性问题，而文学载体的感官记述通常潜藏更为丰富的具地经验与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其价值尚未被充分发掘。在新时代中国文学的边地写作中，感官民族志的实践性与建构性意义尤为凸显。作家周智慧（笔名“阿瑟穆·小七”）是新疆布尔津县人，久居于阿勒泰市的库布东牧业村。自2010年起，周智慧在当地投身农牧劳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亲历的地方化经验糅合进散文集《解忧牧场札记》（下简称“《札记》”）中。《札记》显示出模拟和调动感官感受的艺术特征，生动展现出阿勒泰地区的乡野自然美感、各族乡亲含蓄真挚的情感，以及中华民族的传统游牧生态智慧。

层次丰富、情绪多变的五官之感是形成《札记》恬静隽永风格的重要因素，其中有关声音与听觉的书写，能够在作者与读者之间高效建立身心链接，同时，阿勒泰的若干声音线索形绘出迈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疆实践图景。周智慧结合阿勒泰的地方化身体经验，在富含声音与色彩、兼顾纪实与想象的散文作品中，绘制出阿勒泰的人物群像、风物图景与声音景观，使文学作品既充当了边地斑斓景物的“取景器”，又独具匠心地成为游牧生产生活史的“留声机”。经过新时代新疆文学的创作实践，“阿勒泰”已成为“新西部文学”意象群中的亮眼成分。“新西部文学”以开放包容、自信大方的姿态呈现“新西部”形象，而《札记》凭借现实主义美学基调、净润心灵的主题内容，以及强调在地体验的写作特色，充实了“新西部文学”中新疆散文的写作脉络。

一、阿勒泰感官民族志与恋地的“音轨”

近年来，“边地”作为文学中的问题与方法被日益凸显。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与新媒介的普及既带动了边地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又重构了边地社会的信息传递格局；另一方面，文化与文学艺术内部开始自觉寻求扭转脱离现实生活、趋于同质化的创作走向。因而，具有丰富性、融合性地域特色的边地文学焕发活力，不断涌现出以现实生活为根基、直观反映新时代地方风土人情的创新性作品。在此背景下，中国西部文学创作从自身“地理空间、多民族文化交融经验及复杂现代性特征”[②]中，建构在思想内容和意象表达等方面具备新时代地方特色的“新西部文学”诗学。其中，《札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通过个体感官感受展现从“接触”到“融入”游牧生活模式的鲜活过程，又以客观视角呈现游牧民族松弛自得的“慢生活”哲学与生态智慧，将地方历史内蕴、当代经验与感官体验进行整合，超越单一的“观看”写作范式，形成感官民族志式的边地生活史记录。

感官民族志通过捕获在地感官体验，使某一地方或某种实践方式的“感官生活”（sensory life）得以浮现，并借此对他人世界中的“地方”，以及他人如何感知“地方”做出全面深刻的文化理解。如果说，在人类学意义上，感官民族志的

① 易丰：《何以“真实”：吕西安·卡斯坦因—泰勒感官民族志理论考》，《艺术研究》2026年第1期。

② 邹赞、杨钦增：《西部作为方法：“新西部文艺”的地方路径初探》，《西部文艺研究》2025年第5期。

研究者自身即是方法，那么在以文学为媒介的感官民族志记述中，作者本身即是可供解读的文本。深入阿勒泰牧场生活后，周智慧由原本的创作主体“外视角”转变为“内视角”，获得为游牧文化发言的话语权，在《札记》中描摹出大量本人所触所得之感，如阿勒泰天地间填充的火红、碧绿、湛蓝与净白等浓郁色彩，鼻尖萦绕的奶味与果味，唇齿间油脂的醇厚与黑加仑的甜涩等。作者将大量的五官之感转译为文字表达，是其接受并认同于牧场文化秩序的例证——“马蹄踩过碎石的声音，牧羊犬尾追羊群的叫声，或者，风吹过你的脸庞，扬起你的长发，这些听觉、视觉与触觉，更能间接界定时间。[①]”诸如此类的感官体验描写，同样构成周智慧对阿勒泰的恋地表征——“人对环境的反应可以来自触觉，即触摸到风、水、土地时感受到的快乐[②]”，视、听、嗅、味等感官信息最终由触觉统摄，使得体感活动成为人类与大地达成广泛情感链接的必要途径。《札记》对五官之感的叙写，呈现出作者原有观念与在地经验发生碰撞、融合的有机过程。因而，作为地方文化的深度参与者，周智慧本人的身体化经验构成一种文本，模仿与再现出阿勒泰当地人想象“地方”、生发恋地情感的方式。

周智慧散文写作的感官民族志特征与两种个人经验息息相关。其一是扎根牧场生活。周智慧成为库布东村的一员后，长期置身田野从事农务劳作，又主动承担保护哈萨克游牧文化的工作，恢复起一座民间民俗博物馆——“解忧牧场游牧非遗老院子”，利用收集来的游牧生活老物件重建具有悠久历史的游牧生活场景。周智慧在寻获老物件的过程中与地方空间充分互动，捕捉哈萨克族的生产生活痕迹与文化基因，对游牧“慢生活”哲学的情感灵韵产生历时性理解。其二是周智慧的儿童文学创作经验[③]。较之成人世界，孩童之身更易触碰自然，孩童之心亦然。《札记》不乏天真的童心记叙，但同时作者也将其理性思考加入其中。在纯真童稚的观察眼光中，阿勒泰的“人—地”关系呈现出一方乡野天地处于生命之先、人类之先的特质，生活于此的动物与人类如孩童般深受大自然眷顾。由此可知，文学形式的感官民族志记述植根于作者与地方互动的具地体验（emplacement），是作者身体、灵魂与地方环境相互融合而生成的有机知识。

边地文学创作的根本动因通常离不开恋地情感的表达。《札记》对阿勒泰的抒怀正是围绕乡土立场与恋地表露而展开。该书共编排四组专题：其一是确立核心人物形象，刻画出老皮匠努尔旦、拯救母牛的加尔恒和布鲁尔、“博学多识”的水管工托鲁斯，以及开货车的努尔兰等令人印象深刻的立体人物肖像；其二是释讲自然之物与牧场老物件，包括锦鸡儿灌木、忍冬、苜蓿、藜芦、紫草、指甲花等阿勒泰地方物象；其三是叙写人物之间发生的牧场生活趣事，例如老奴尔旦与玛依拉的夫妻生活琐事，老奴尔旦与扎特里拜两位老伙计的幽默对谈，性格温和的布喀与哈江医生如何包容脾气暴躁的阔孜，以及库其肯奶奶怎样对年轻人“热心过头”等；其四是聚焦万物有灵与生命之贵，讲述老牛为母则刚的坚毅，布鲁尔救护土拨鼠的来龙去脉，古丽娜充当小羊羔妈妈的动人情节，也写下善良的小达娜、满怀爱心的

① 阿瑟穆·小七：《解忧牧场札记》，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 年，第 7 页。

②〔美〕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 136 页。

③ 周智慧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有《我的羊驼小蜜糖》（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4 年）、《从前啊，有只猫小宝》（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6 年）及《淘气的小别克》（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 年）等。

小别克等天真孩童的温馨故事。《札记》的各个篇章对阿勒泰地方的人、事、物有不同程度的侧重，主要以身体化的记述方式串连各篇章主题内涵。借助对具地感官体验的厚描，《札记》呈现出阿勒泰地域化经验与“人—地”情感在多代际、多民族间流转的鲜活过程，使得景美、人美、情美的阿勒泰形象跃然纸上。

文学作为感官民族志的重要表征媒介之一，能够出色表达定域性的感官经验。人们熟悉自身所处的地方空间，但难以清晰表达他们对于地方的感官感觉与内心感受，而文学语言与文学想象力却能弥补这一缺失。在写作者深度参与在地生活的前提下，“将民族志、艺术和媒介表现形式相结合，能够创造出一种强烈的亲密感，从而激发受众的共情理解，并向他们传递体验性认知……声音和气味也被认为具有创造新形式的意识和亲密感的潜力。[①]”《札记》在散文抒情中综合调用感官活动，令人密切感知到阿勒泰空间环境中的万物肌理（texture），如挑选甜瓜需“眼观、手敲、闻香、听声”，再如羊粪与干草和阳光反应，生发出能够安顿人心、饱含生命力的味道。“环境可能不是产生恋地情结的直接原因，但是却为人类的感官提供了各种刺激，这些刺激作为可感知的意象，让我们的情绪和理念有所寄托。[②]”不过也需意识到，文学中的感官书写作为表达恋地情结（topophilia）的手段，大都围绕视、听、嗅、味、触五感，却难于传递气压、湿度等密切影响人类体验的其他感觉维度。

然而，即便是基本的听觉、味觉与触觉，也在由视觉主导的现代社会中被长久忽视。《札记》则唤醒文学写作的多元感知，在实现多重感官调谐（sensory tuning）的过程中，衬托出声音与听觉的独特效用。《札记》一方面着重描写发生在阿勒泰地区的声音现象与声音事件，包括自然环境、有机生命与人类活动等类别，另一方面还记述下声音接受者丰富的听觉经验，为边地文学的恋地情感表征增添了灵动的“音轨”。“关于环境的声音无人可知，可是当这些环境中与人融为一体的声音被清楚捕捉时，它们构建了‘具地体验’的无限可能性。[③]”在文学作品中，声音元素是觉察身体在场的重要提示，剥离视觉的听感通常成为身体的重要化身。《札记》中的声音书写与听觉叙事，能够唤起作者与读者双方具身体验的同时在场。具身听感不仅可以使双方一同沉浸于阿勒泰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音景，而且能使两者细听哈萨克族游牧生活的人类社会音景，深入了解游牧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实状况。文学作品本就具有调动读者感官想象的潜能，《札记》中声音与听觉书写在激发读者进行移情性参与方面显示出强大的感召力，这种融汇了多元立体感官叙事的“唤起式写作”（evocative writing），帮助读者通过声音与听觉的渠道直观体认各族群众亲密无间的生活，以及在阿勒泰乡野牧场已然形成坚固的情感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以及人与自然万物命运共同体的社会事实。

二、阿勒泰自然音景的文学建构

《札记》并非阿勒泰音景的简单搬运，而是运用文学再现手段，创作出具有生命感与想象性的阿勒泰边地音景，完成感官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音景构建。同时，作品引导读者化身为听众，进入纯粹的阿勒泰感官世界，感受游牧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复杂交织中向前演进的过程。在信息

①Sarah Pink，Doing Sensory Ethnography.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id，2015. p.165.

②〔美〕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第168页。

③陈婉乔：《感官民族志：超越主客体的感官唤醒——人类学纪录片的边界重塑》，《世界电影》2022年第1期。

过载的新媒体场域，舒缓与静谧的边地音景成为人们寻觅的现实飞地。在此意义上，阿勒泰牧场音景起到的作用，不仅是呼唤单纯的感官减负，而且使人们重新找回对身体在场的确认，还在叙事功能上辅助读者沉浸当地的视觉风景与生活秩序。然而，从网络数字空间获取某一地方的风景与音景，易于滑向抽离现实生活条件的虚假结果。因此，应当结合感官民族志的具身性反思对地方的感知，从具地音景中听取自然环境与日常生活的真实声音线索。

《札记》在四组专题文章中渐次揭开阿勒泰自然之声的面纱，最先以阿勒泰的动态声音俘获读者之耳——牧场内，通常“路权”为马牛羊享有，家畜在马路筑成一堵闹哄哄、毛茸茸的“墙”；在阿勒泰大尾羊群中，从头羊警告的咩咩声、母羊呼唤小羊的叫声里可听出情绪信息；羊群躁动喧闹，远处突然传来牧羊人的一声长哨牵制住羊群的冲动；与牧羊人交谈时，“因为羊的咩咩声依然很大，因此你只见他张嘴，而听不到他的声音。[①]”闹哄哄的声墙和听不到的牧羊人说话声音，形成鲜明的听感层次与强弱对比。然而，在更为广阔的乡野间，沉静构成了阿勒泰牧场的基调音。行驶于道路之上，除车轮在石子上磨出的沙沙声外，没有一丝杂音。沉静是构成阿勒泰地方慢生活哲学的物质性因素，“我”的存在因为沉静而得到确认：“除去远方有一声鸟鸣，周遭安静极了，连我自己的血液流动声都能听见。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现在，我知道了，那叫‘合一’，心灵融入自然，自然渗透身体。[②]”除人类外的自然万物也在沉静中积蓄生命力量：“寂静中，传来枝条突然折断的声音，像是有飞鸟扑入灌木……原来是黑加仑不堪自身果实的重负，把那纤弱的枝条压折跌落下来的声响……”[③]

阿勒泰种种自然声音现象的出现与改变，既指向人与地方的物质和能量关系，又揭橥大地风景的改变。春天之声蕴藏新生命集体涌现的力量，牧草摇曳附和羊群熙攘奏出天籁，春风吹响一夜后，群山环绕的牧场已被绿色覆盖：“即使到夜晚，我们在薰衣草地里散步，蜜蜂仍在紫色碎花间忙碌不停。嗡嗡声汇集到一起，如同群蜂在我耳边，让人昏昏欲睡，又不得不严阵以待。[④]”牧场夏季音景因获得雨水润泽而整体响度渐强，生命活动之音饱满明亮：“晃动的阳光斜洒在草地上，水汽蒸腾而上，缥缥缈缈，人们仿佛能听见几周来饱受烈日烘烤的草地喝水的咕咚声响。微风吹过，野花乱颤，成群的蜜蜂在野花间忙碌。头顶啄木鸟咚咚咚的忙活声，总让人感到愉悦。那声音很是响亮，不知疲倦似的，还带着一丝急切——简直就像客人的敲门声，让人不禁想要回应……夏夜时分，关灯入睡前，我总会听到屋外燕子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那声音干净清透，有催眠效果。[⑤]”而作为北方边地音景重要角色的冬季之声，再度加深了读者对阿勒泰地理空间身份的确认感：“十一月初的某个傍晚，羽毛般的雪片悄无声息坠向大地，铺满阿勒泰的每一个角落。漫长的雪季开始了。一觉醒来，万籁俱寂……雪又干又脆，脚踏上去便发出破碎的声音。早起的牧民，骑着马到镇上的集市赶早市。马蹄踩到雪地上的咯吱咯吱声，清晰、尖锐又刺耳，对于早起赶路的人，能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整个雪季，乡野沉寂无声，树林里几乎没有人的踪迹。从未踩踏的积雪深达半米，在一些洼地，积雪甚至深达人的腰部。这里，除了偶尔听到树枝扛不住积雪的重压折断

① 阿瑟穆·小七：《解忧牧场札记》，第 20 页。

② 同上书，第 78 页。

③ 同上书，第 78—79 页。

④ 同上书，第 76 页。

⑤ 同上书，第 97、99 页。

的声音外，万籁俱寂，让人几乎以为时间停滞了一般。[①]”能够吸附声音的冬雪更加凸显阿勒泰的沉静，而生存于此地的人们不为大雪覆盖而沮丧，鲜有的生活音痕在大地音景中显得更为响亮。

沉静衬托出阿勒泰万籁共鸣的自然声响特质，细听自然音景成为《札记》的核心听觉体验。雷声、水声和风声被认为是象征生命起源的元初之声，它们既是听觉的，又是触觉的。晴朗和煦的阿勒泰也不免经受风雨洗礼：“雷声起初只在远山隐隐滚动，才一会儿就逼近耳边了。雷电过后又起了风，狂风裹挟着大雨。门一次次被吹开，扑进一阵阵雨来，窗子也被吹得啪啪作响。我们熄灭电灯，拔掉电源，拴住门窗，躲进被窝。阵阵阴风，不知从哪个缝隙钻进屋内，如同鬼魅。我紧张得双手抓住被边，脚趾在被子下蜷得紧紧的。此后的一个多小时，大雨就像决堤了似的哗哗冲刷屋顶和庭院。离我家院落不到五百米的后山，过量的雨水在寻找山路，发出古怪的咕噜噜咕噜噜的声响。那水声仿佛就在枕边，阴森森的有点可怕。当暴风雨渐渐走远，黑色夜幕上居然露出了被冲洗干净、亮闪闪的星星……我放松地躺在床上，倾听屋外大自然的声音。起先是一只鸟试探着叫了一声，接着第二只鸟也叫了，然后无数只鸟都叫了起来，直到叫醒羊栏里静寂的羊群。[②]”声音被用来呈现地方天气，同时也传递出空间远近、明暗夹杂、动静交替等过程带来的共感（synaesthesia）体验，令阅读过程密切联动身体感觉。

身体感觉具有复杂的筛选机制，时刻处于动态的运作过程。在地方空间自然声场的环绕下，身体行为受到环境声音信号的影响与指导，形成特定的身体实践，如哈萨克族老乡身体性的语言特征：“当牧场的牧羊人为你指明方向时，需细心观察他的下巴抬起的高度和声音拖延的长度。这些，极为重要。如果下巴只是微微抬起，语音拖了一个半节拍，那么翻上两三个山坡就有指望。如果下巴抬起，和地面平行，手臂抬起，眼睛望着指尖的方向，语音拖了三四个节拍，那么你就得做好翻五六个山坡的心理准备了。如果下巴抬起超过九十度，语音拖到声音颤抖，气息显示有点缺氧，指着方向的手指稍微晃动，那么你就得把心态调整到不翻上十几个山坡，绝不可能到达目的地，或者天知道什么时候到的状态了。[③]”同时，感官活动的运作机制总是联系着象征隐喻，人与地方的长期交融生成地方性声音意象。地方音景中的声音意象通常是地文与人文的综合物，既能够指认地方风物，又可以实现地方物象的意义生产，例如游牧生活的四季转场，使牧民们积累下诸多地方性风物知识，并蕴藏于阿勒泰地方的口传民俗——沙葱、骆驼刺、苍耳和蒺藜等植物，被游牧民族发掘出多种生活用途，如薄荷在哈萨克语中被称为“加勒布孜”，有草原流传俗语说道：“有加勒布孜的地方，人不会死”。

“地方的意象就是地方的认同”[④]，正因周智慧本人对阿勒泰感官意象产生透彻了解，才在其自身与地方之间搭建起牢固的认同感，也得以带领读者进入阿勒泰的生活与文化圈层。“尽管环境能为恋地情结提供意象，但并不意味着环境对恋地情结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也不代表环境拥有强大无比的能唤起这种情结的力量。[⑤]”然而，牧场山野的自然音景与声音意象却有能力将主体代入环境，并帮助其与大地拉近关系，建立情感关联：“看书久了，我会躺在被我称之为‘大自然沙发’

① 阿瑟穆·小七：《解忧牧场札记》，第148、151页。

② 同上书，第96页。

③ 同上书，第13页。

④〔加〕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刘苏、相欣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91页。

⑤〔美〕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第168页。

的树干上休息。四周一切，寂静无声，所有植物看似静默温顺，其实不然。在我们享受植物带来的种种恩惠时，丝毫没有发觉植物与命运的抗争，一直都在激烈进行着。因为它们的根部被束缚在土地里，从生到死都无法抽身走动，为此，它们必须费尽心思，比人类更懂得摆脱禁锢命运的枷锁。[①]”“ 声音属于感性与想象经验的广阔复调 ”[②]，“ 我 ”与阿勒泰大地之间去除了冗余的中间媒介，最大程度地通过身体听感进行直接接触，以空气、水、动物、植物等为媒介，闻听大地的呼吸，从声响密度过饱和的现代城市音景中得到释放，进而形成对边地声音生态的客观理解。在《札记》的声音生态观表达中，人类活动声音只是嵌入在自然声场之内的点缀，人与自然在游牧社会形态达成圆融的声音共同体：“ 一定有只夜莺栖身路边那棵沙枣树上，它的婉转鸣啼划破了寂静夜空。夜风把远处窗户里冬不拉的低低弹奏声、杯盏声和谈笑声吹送过来。[③] ”

《札记》对声音景观感知的强调，弥补了视觉对阿勒泰地方空间的片面观察。而且，文本在书写文学音景时激活多元感官知觉的联觉体验，最终达到调动读者的思维和行动意愿的效果。此外，《札记》在文学记叙中实现个体感官日记（sensory journaling）的搭建，生产出十足丰富的自然音景，这主要得益于文学写作能够反映出作者跨文化的感官体验及感知认同变动。在感官体验的坐标中，记录者与阅读者打破了由自身文化背景形成的无意识感官习惯，进而根据地方特质重新建立感知网络，编织出具有地方记忆与地方想象的感官地图。在此意义上，“ 地方 ”也不再是一个静态概念，而是在随机感官事件的作用下形成的连续过程。

三、聆听阿勒泰：传统与现代社会的间奏

文学媒介的感官民族志写作还可说明，人类在获取地方性的隐性知识时，不单依靠视觉观察与理性推论，亦需要各种感官协同工作，通过感性与想象路径了解并融入该地方的社会生活与文化逻辑。感官感知网络的构建除了受地方场所自然环境的影响外，还被文化语境及社会环境所形塑，任何感官行动都无法脱离某种社会文化的实践脉络。感官民族志有意挖掘不同感官的综合作用如何与社会活动及文化观念互相塑造，“ 身体体验与文化观念紧密结合，成为组织、归纳感官接受多种信息的网络，使得这些信息成为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体验。[④] ”倾听本身亦构成发言，“ 民族志研究应包括人们日常所闻 ”[⑤]。因而，综合聆听阿勒泰自然与社会音景，是考察该区域人类社会与地方关系不可或缺的路径之一。《札记》的感官民族志记述连通着游牧社会从传统驶向现代的演进过程，在此过程中可以听到阿勒泰各族民众聚居、生产、集会与仪式等方面的声响变化，并揭示出阿勒泰社会游牧传统与现代性复杂结合的边地声音样态，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新时代边地音景对于城市声音生态而言弥足珍贵的价值。

声音表征的游牧生活方式趣味盎然，在热闹的哈萨克族传统集市中，常听到持家主妇对商品的夸张评判：“ 她们觉得奶疙瘩太酸，发酵时间太长了！馕硬得硌牙，烤了有一天以上吧？牛肉

① 阿瑟穆·小七：《解忧牧场札记》，第 82 页。

②Don Ihde，Listening and Voice: Phenomenologies of Sound. 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7. p.119.

③ 阿瑟穆·小七：《解忧牧场札记》，第 95 页。

④ 张连海：《感官民族志：理论、实践与表征》，《民族研究》2015 年第 2 期。

⑤〔美〕斯蒂芬·菲尔德、〔美〕唐纳德·布莱内斯：《做人类学的声音研究》，王敦、黄彩英译，载王敦编译：《听觉文化研究（译文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 100 页。

肠里放的牛油比例太大……‘哼！休想逃过我们的眼睛！’临了，她们还会抛下这么一句让摊主心悸的话。这还没完，因为她们还会跟声音可及范围内的每个人分享自己的不悦。[①]”描写集市的叙述视点也随声源切换而跳转：“他们的交易被装满甜玉米的货车喇叭声打断了，我赶紧跳到一旁，免得压着脚。只见半个身子探出车窗的货车司机，张望着周围的人群，牙缝里挤出一声口哨，然后大声嚷嚷：‘嗨，嗨，借道！借道！借个道——’随后一路挤过人群密集的路段。他身后还跟着一辆小货车，满载一罐罐的蜂蜜，匆匆忙忙找寻合适的摊位。[②]”传统集市的熙熙攘攘是阿勒泰声音生产的特色场景，和现代商场充斥的“背景音乐”（muzak）[③]形成鲜明对照。现代商业的背景音通常为程式化编排，降低声音个性化程度的同时剥夺听者对声音的体验，使人们毫不察觉地浸泡其中，从听觉上感觉不到声音的实存。现代生活将人类引向视觉的高地，消声的视觉景观空间被极度收缩，而声音与听觉的在场可以让空间流动、丰富并活跃起来，人们对日常空间的体验也因听觉得到延展。当人们对阿勒泰的壮美风景想象得到热闹的生活音景的扩充，饱满的地方形象才得以被建立。

感官民族志对视觉信息的扁平化发起挑战与反拨，强调感官感受的系统性。《札记》中的声音整合气味、口味等其他质感，重新拾回视觉符码脱落的地方信息，构成阿勒泰现实世界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如库布东村的冬季雾凇，春天最早盛开的野生金莲花，哈萨克族的奶疙瘩、酥油、黑加仑果酱与果酒，婚礼仪式现场以及“有的是时间”的慢生活宣言等意象中，多重感官维度交织掺杂，生发出体认阿勒泰地方人际交往方式的身体感。“由于人们的意向性具有聚焦性，也有各自的独特性，因此，产生出来的意象就可能会被他人认为是狭隘的或偏见的，但是，对于这些意象的持有者来讲，这些意象却是整全的，并构成了整个地方的现实处境。[④]”因此可以说，《札记》还反映出感官民族志记录者具备跨文化视角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在某种情况下，就地方感而言，外来者可能会比当地人看到更多的事物，正如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尽管他不具有当事者的那种参与性。[⑤]”而同样重要的是，对地方音景意义的捕捉与体悟，建立在作者长期深入与细腻的聆察基础之上。高级别的聆听是“能够听到那些不会发声者的声音”[⑥]，记录者唯有真正深入聆听地方音景，才有可能真正发现其中未经察觉的声音意涵。

感官民族志对视觉信息的扁平化发起挑战与反拨，强调感官感受的系统性。《札记》中的声音整合气味、口味等其他质感，重新拾回视觉符码脱落的地方信息，构成阿勒泰现实世界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如库布东村的冬季雾凇，春天最早盛开的野生金莲花，哈萨克族的奶疙瘩、

① 阿瑟穆·小七：《解忧牧场札记》，第126—127页。

② 同上书，第129—130页。

③Jonathan Sterne，Sounds Like the Mall of America: Programmed Music and the Architectonics of Commercial Space. Ethnomusicology vol. 41，no. 1，1997.pp.22—50.

①〔加〕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刘苏、相欣奕译，第92页。

② 同上书，第102页。

③傅修延：《听觉叙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68页。

数媒时代将人们的注意力投掷向遥远的云端或是形而上的思考，并且令人们忽视正在切身经历的周遭世界。感官民族志的记录与阅读都能够引发主体重启对周遭现实的感知。“ 眼睛比耳朵能从环境中带给我们更加精确与细致的信息，但我们却经常被听到的东西所打动。[①] ”“ 听 ” 相较于 “ 看 ” 带来的感知活动往往更易触发情绪变动，调动人的情感体验。落于文字的声音虽不能真正在耳边响起，却能够激发读者想象与构建场景的能力：“ 集市还有一种特别的氛围：大家都是一副好脾气，熟悉的陌生的人都可以随意闲聊，你很少在这里看到不痛快的脸，也很难看到有人行色匆匆。熟悉的人在集市相遇，还会拿出一点时间搜罗搜罗新鲜事儿，说说村里谁家男人和女人打架了，谁谁的孩子考上了城里公务员，或聊聊天气状况。其实，聊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交际，这让集市之旅又添了一点趣味。[②] ” 同时，听觉与声音也为身体带来空间性与时间性的感知：“ 你站在那儿，呼吸全世界最纯净的空气，聆听小鸟们热闹的啾啾声和蜜蜂的振翅声，以及某头望不见踪影的母牛呼唤小牛的哞哞声，还有小牛响应召唤跑向母牛身边时空灵的铃铛声。除此之外，就是耳边呼呼的风声。[③] ” 在拟声词的使用中，听者不自觉地将其肉身与环境声音结合起来，没有电气之声的阻隔与侵扰，沉浸体会时间从加速的束缚中解绑，恢复平缓的流动。

“ 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现代性的社会法则悄然注入传统游牧生活，在阿勒泰音景中形成不同时代声音感知前后交替、互相碰撞的间奏形态：“ 小径杂草丛生，我心却毫无杂念。这个美丽的早晨，安静无风，碧空如洗。渐行渐远中，城市消失在遥远的记忆里。脚下的泥土松软舒适，我越走越慢，这不是因为疲劳，而是因为身临其境的愉悦让人如痴如醉。[⑤] ”《札记》中这种间奏还呈现为隐含冲突的时空逻辑：“ 时间和距离，对于哈萨克牧民是极富弹性的东西 ”[⑥]。在阿勒泰的生活惯例中，少有耳闻“ 抓紧 ”，多会听见 “ 马上 ”：“ 这里的 ‘ 马上 ’ 通常是指一个小时以上，结合实际情况，也许还会需要更长时间。[⑦] ” 现代生活的效率逐渐逼近传统的生活节奏，但无法彻底颠覆地方固有的 “ 人—地 ” 栖居关系。牧场集市上的 “ 非主流小伙 ” 也依然穿着具有严肃仪式感的 “ 袷袢 ”。可见，尊崇自然生态的游牧文化传统，即使与现代逻辑相遇后做出折中改变，也依然有其自身稳定的内在发展节奏。人们在电力社会中滑向 “ 简化聆听 ”（reduced listening）[⑧]，在种种机械复制声音的围绕中被渗透、阻断身体感知。《札记》中出现的种种阿勒泰地方声音并非被机械复制或原封保存，而是对转瞬即逝的声音信号的文学再创造，因而，读者通过声音记录者之耳能够聆听 “ 活着的 ” 阿勒泰。没有工业噪音的静谧牧场，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出

的产物 ”，现代性的社会法则悄然注入传统

①〔美〕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第 10 页。

② 阿瑟穆 • 小七：《解忧牧场札记》，第 128 页。

③ 同上书，第 6 页。

④〔德〕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87 页。

⑤ 阿瑟穆 • 小七：《解忧牧场札记》，第 143 页。

⑥ 同上书，第 9 页。

⑦ 同上书，第 14 页。

⑧ 现代声音技术催生出 “ 简化聆听 ” 方式，它总指向被录制下来的、无声源的、固定不变且被反复听取的声音。参见〔法〕米歇尔 • 希翁：《视听：幻觉的构建》（第 3 版），黄英侠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年，第 26—28 页。

通过声音记录者之耳能够聆听“活着的”阿勒泰。没有工业噪音的静谧牧场，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出未被声音暴力控制的地方性优势。在文学媒介的感官民族志记录中，可见阿勒泰活生生的边地音景拒绝沦为可被复制与再利用的“声音纪念品”（sound souvenirs）[①]，还可将外来者从现代性的噪音中短暂解放，回归对自然声音的本真审美。

《札记》中的个人化听觉记述与声音意象再现，根本上服务于作者恋地情感的表达。“主体间性的深度连接，可以让意象完全地结合在一起，进而产生‘我们’的最紧密联合。这就是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的社会化，它赋予地方以认同，它源于存在的内部性，或者产生于神圣的地方所具有的神圣体验，它是高度个人性的，但同时也能实现共享。[②]”周智慧借助散文写作分享个人的声音与听觉经验，本质上体现了感官民族志记录者由现实出发描写生活，吐露对牧场邻里、自然生灵与地方空间的内心情感。因而，对人与大地之间情感纽带的凸显，是文学形式感官民族志的特殊功能。《札记》从自然与社会两层面完成阿勒泰综合音景的塑造，折射出传统游牧社会对时代变更的自我接纳方式，同时也示范出如何以“体验中的身体”还原对地方空间意义的全部感知。

结语

与其说是周智慧选择了散文，不如说是阿勒泰选择了散文。作家梁晓声在序言中以“散文态”形容该文集的整体气质，实则道出阿勒泰赋予人们恬静自在的地方心境。阿勒泰地区极具流动性与融合性的文化性格，催生出《札记》浓郁身体化、在地化色彩的独特文学审美价值。《札记》看似周智慧的个人志，但该书恰为读者提供了与阿勒泰进行深度交流的身体入口。感官民族志式的散文态复原出人们的真实感官知觉，在文学媒介中打通感受真实世界的具身路径。在实景、实物与实情中记述的感官民族志，提醒人们重新发挥感官能动性，意识到人与大地之间紧密接触、建立情感链接的重要性。从《札记》大量记述、想象阿勒泰游牧生活的声音与听觉片段中，可“听”出阿勒泰生命共同体内部多要素、多角色的地方性风味。人们固然在厚重的历史沉淀与迷人风景中流连新疆，但更在新时代新疆文学提供的“听觉想象力”（auditory imagination）中生成新时代新疆的地方想象与“新西部”形象。《札记》鲜明刻画出阿勒泰边地的立体感官图式，有力激活人们在视觉之外的审美感知，并以此作为理解人与环境间关系的核心途径。在焦虑饱和的数媒时代，《札记》为拥挤忙碌的城市文明绘制出向往的边地生活愿景。

[基金项目：中国文联理论研究部级课题重点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新时代民族文艺评论话语体系建构研究”（ZGWLBJKT202513）]

作者简介：

楼旸（1998—），新疆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①R. Murray Schafer，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Rochester：Destiny Books，1994. p.180.

②〔加〕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刘苏、相欣奕译，第 94 页。